

寻踪觅迹，终得真谛

——试论田本相及其曹禺戏剧研究

宋宝珍

内容摘要: 田本相对于曹禺及其戏剧的研究,在新时期带动了学术界“曹禺热”的形成,这股热潮至今方兴未艾。本文试图分析田本相一系列曹禺研究成果的形成、其中的研究方法、主要学术观点以及重要学术贡献等。对于田本相在学术研究所运用的访谈调研、文本阐释、比较艺术学、文化现象学等批评方法也予以了总结和概括。本文指出,田本相的曹禺研究,从剧作家出发,摹画曹禺的灵魂,发现其创作动因;从戏剧文本出发,阐发了曹禺戏剧的诗化现实主义风格;从文化意义出发,揭示了曹禺戏剧的现代性与民族性;从悲剧内涵出发,阐明了曹禺剧作的美学价值和他自身的悲悯的人文情怀。

关键词: 田本相 曹禺 话剧评论 话剧史
DOI:10.19324/j.cnki.zgwypl.2020.10.006

关于曹禺及其戏剧的研究,可以上溯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自《雷雨》(1934年)、《日出》(1936年)、《原野》(1937年)、《北京人》(1941年)、《家》(1942年)等著名剧作问世以后,很多文艺评论家予以关注并加以阐释,其中不乏茅盾、夏衍、李健吾、朱光潜、叶圣陶、杨晦等知名大家,他们的解读与评价开拓了曹禺研究的路径。

如果说对于任何文艺作品的思想意义、美学内涵、文化价值的评估,都需要时间的积淀的话,那么新时期以来的曹禺研究,无疑具有承前启后的优势。在新时期曹禺研究中,田本相致力于曹禺生平与创作道路的考察与还原,对于曹禺剧作的研究进行了不断

地深化和拓展,“最初把他概括为一个诗化现实主义的作家,以为是一个发现;接着,又终于认定他是一个现代主义的剧作家;直到近年来,我更集中地感受着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文主义戏剧家”。^[1]田本相对于曹禺的创作心理、戏剧成就、美学贡献、思想意义、风格特点等进行了全方位、多层面地研究与阐释。且不说他所收集、整理、出版的一系列曹禺生平与创作资料,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文献;便是他所运用的访谈调研、文本阐释、艺术比较、结构分析、典型释

[1] 田本相:《一个渴望自由的灵魂——为纪念曹禺百年诞辰而作》,《曹禺探知录》,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第114页。

例等研究方法,对今天的研究者仍具启示意义;而他对于曹禺创作心理和潜意识层面的“潜流”的追踪与揭示,对于人们认知曹禺戏剧的思想高度、人性深度,以及戏剧性、民族性、现代性、经典性等内涵,都具有深远的学术引领和借鉴意义。

—

田本相常常说自己是半路出家研究戏剧,这或许是自谦之辞,但焉知未有自得之意呢? 20世纪60年代,他师从南开大学教授、鲁迅研究专家李何林攻读硕士学位,专业方向是现代文学。那个时代的鲁迅研究,在既定的“民族灵魂”的总体框架下进行,但田本相却不甘为固有结论提供局部证词抑或诠释他人话语。有比较才有鉴别,这是他执着于内心的研究信念。为此,在熟读《鲁迅全集》的基础上,他按照现代文学发展的时序来阅读其他作家的选集以及长篇,从而形成记忆中的语境关联和前后对照,勾画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而对一些具体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审思,则相应形成了参差错落的比较与辨析。这是一种文本研究的“笨”办法,却是行之有效的新发现。在对鲁迅小说与其他现代作家的作品进行的多层面比较中,透过题材类别、体裁样式、思想价值,以及典型刻画、情景描写、叙事方法的相通性和差异性,他发现了鲁迅作品思想的深刻性和艺术的经典性。以致20世纪80年代,从他发表于《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呐喊〉与〈彷徨〉与“五四”时期小说之比较研究》^[1]的长篇论文中,犹可见他对鲁迅研究中“平行比较”方法的喜好。

转向曹禺及其戏剧研究之前,田本相已经拥有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开阔视域和知识谱系,因此,这是他在现代文学的研究视域里“横看成岭侧成峰”之后,把曹禺研究认定为值得攀登的学术研究的高峰。其实,早在南开读大学和研究生时期,田本相看过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曹禺剧作,也阅读过曹禺解放前创作的剧本。他一旦选定了研究目标,不仅对预期的学术成果充满自信,而且已经大体估量了其文化价值。

1978年,田本相在《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了论文《〈雷雨〉〈日出〉的艺术风格》^[2],1979年在《戏剧研究论丛》发表了论文《〈雷雨〉论》^[3]、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发表了《〈日出〉论》^[4],1980年完成了著作《曹禺剧作论》,次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在《曹禺剧作论》完稿之前,田本相不曾与曹禺谋面,只是一味坚持着他文本研究的独立性和客观性。《曹禺剧作论》的初稿完成之后,中国戏剧出版社准备出版,而出版之前,社长杨景辉将书稿交与曹禺审读。

在《曹禺剧作论》完稿之前,田本相不曾与曹禺谋面,只是一味坚持着他文本研究的独立性和客观性。《曹禺剧作论》的初稿完成之后,中国戏剧出版社准备出版,而出版之前,社长杨景辉将书稿交与曹禺审读。

[1] 田本相:《〈呐喊〉〈彷徨〉与“五四”时期小说之比较研究》,《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5期,第1-13页。

[2] 田本相:《〈雷雨〉〈日出〉的艺术风格》,《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4期,第95-103页。

[3] 田本相:《雷雨》论,《曹禺剧作论》,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第29-65页。

[4] 同上,第80-124页。

1980年5月23日,曹禺在家中邀见了田本相,这是两人第一次相见。曹禺对田本相说,“你的书写得很深刻,你评论我的剧本,有些是我在创作时没有想到的”^[1]。谈话中,曹禺引用《诗经·巧言》中的“奕奕寝庙,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圣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以说明艺术家与批评家的关系。他二人的相遇、相知是具有“戏剧性”的事情:他们同是天津人,家世颇为相似,都是曾经富足而渐趋破败的封建家族;曹禺曾经就读的南开学校、南开大学,恰巧又是田本相的母校。

曹禺女儿万方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回忆,20世纪80年代,田本相总是背着书包,带着老式录音机到家里来与曹禺见面:“那时候他们两人一坐就是半天时间,有时我父亲会留他在家吃饭。他们的交谈方式基本上是田本相提问,我父亲便信马由缰地谈,回忆到什么就谈什么,这些录音最终也都整理成了文字出版。那时候只要父亲身体很好的情况下,田先生就会来我家。他们二人相互之间应该不仅仅是彼此认可,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知己的关系。”^[2]一颗寻求理解的灵魂和另一颗真诚探寻的灵魂开始对接。

1981年《曹禺剧作论》面世,田本相在书中指出:“《雷雨》是标志着中国话剧走向成熟阶段而飞出的第一只燕子;它的现实主义

成就为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传统奠定了一块有力的基石;而它的民族化群众化的尝试,显示着中国话剧民族化群众化的最初实绩。”^[3]应当说,“曹禺剧作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话剧的成熟”这一论断,至今已是中国戏剧界的共识,也是《曹禺剧作论》的重要学术贡献之一。1984年此书荣获全国优秀戏剧理论著作奖。

朱栋霖指出:“它是国内全面、系统研究曹禺剧作的第一部专著,而且观点鲜明,分析细腻深刻,颇有独到之处。”“这些分析,可以说是入木三分的。”此书的出版“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可贵的收获”。^[4]尽管著作受到了当时社会意识和思想解放程度的限定,但此书以第一手历史资料的发掘、严肃谨慎的学术态度、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无庸辩驳的公允结论,奠定了新时期以来曹禺研究的思想基础。

但是,作为改革开放初期的研究成果,《曹禺剧作论》的理论框架、思维方式、判断标准还明显带有特定时期的历史印记,甚至是思想局限。有人认为《曹禺剧作论》在艺术方法论上对旧格局的突破还有很大空间。也有人认为,此书某些论断和沿用的成说颇有商榷余地。比如,在人物分析中沿用阶级斗争逻辑,特别强调曹禺剧作的现实主义特色以及群众化趋向,一些批评话语也存在理逊于情、评判代替研讨的问题。

[1] 田本相、刘一军编著:《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页。

[2] 刘臻采写:《田本相病逝,中国话剧研究痛失领路人》,《新京报》2019年3月7日,第C04版。

[3] 田本相:《曹禺剧作论》,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第79页。

[4] 朱栋霖:《读〈曹禺剧作论〉》,《文学评论》1983年第1期,第132-133页。

二

田本相的曹禺研究起步于改革开放时期,那是一个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年代,是一个中国人摘掉木头眼镜、正视世界的年代,也是学术界闹闹嚷嚷要重写文学史、艺术史的年代,更是田本相精力旺盛、厚积薄发、奋发有为的年代。作为大学教授的田本相,白天要授课,他的学术著作“大多是在夜间写作,星期天则是最好的突击写作日。而假期,就成为写作的节日了。记得暑假期间,我就躲到办公室里。有时汗流浹背,独自一人,我就脱掉上衣,埋头写作。有时,写不下去,就大声朗读剧本,让自己化身角色,进入戏剧的情境之中,揣摩人物的心理,体验矛盾冲突的力度,品味语言的魅力。每有所得,就独自开心,在办公室里手舞足蹈”。^[1]他像一个淘金者发现了金矿一样,发现了曹禺及其戏剧,他兴奋着、守卫着、开掘着、憧憬着,既有将被颠倒的一切重新扶正的勇气,也有在学术园地里披荆斩棘的意志。

继1981年《曹禺剧作论》出版以后,田本相的曹禺研究不断深入,先后出版了《曹禺年谱》(1985年)、《曹禺传》(1988年)、《曹禺研究资料》(上、下,1991年)、《中外学者论曹禺》(1992年)、《曹禺评传》(1993年)、《曹禺全集》(七卷本,1996年)、《曹禺研究论集》(1998年)、《简明曹禺词典》(2000年)、《苦闷

的灵魂——曹禺访谈录》(2001年)、《海外学者论曹禺》(2014年)等等。这些重要的学术成果,不仅标定了曹禺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乃至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价值,而且确立了田本相在曹禺学术研究史上的重要位置。

田本相在曹禺及其戏剧研究方面不惜心力、耗时数十载,除了缘于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灵魂的约定和心灵的默契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如田本相所言,他所遇到的是“说不尽的曹禺”。我想,这种“说不尽”的意味大约包含了三个方面:一是作为经典文本的曹禺剧作所具有的深刻的人文内涵和丰厚的美学内涵;二是作为文本之外的一种艺术创造现象,曹禺本身集中了丰富的艺术经验,深刻的内在矛盾和复杂的“江郎才尽”原因;三是作为一种文化研究的范式,曹禺研究在规模和程度上,都没有达到理想的学术目标,特别是他在文化史上的意义还有待进一步的认识和确立。基于此,田本相对他在曹禺研究方面所耗费的心智不仅无怨无悔,甚至满怀信心地说,当历史剥去了罩在人们眼前的层层雾障之后,曹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的地位,一定不会居于人后,他在文化价值的排名榜上一定还会往前提。

曹禺说:“人是很复杂的,也是最宝贵的。”^[2]如何状写一个具有复杂内心和宝贵灵魂的曹禺呢?田本相用五年时间完成了四十多万字的《曹禺传》,对于此书,他是抱有雄

[1] 田本相:《“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视田笔耕记——田本相回忆录》,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108页。

[2] 田本相:《曹禺传》,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后记”,第546页。

心壮志的。为此,他翻阅了大量名人传记,他希望如同罗曼·罗兰写贝多芬、欧文·斯通写梵高、茨威格写巴尔扎克一样,写出“一个我所认识和理解的曹禺”：“一、曹禺有着他丰富而独具的性格特色……他对人生、对世界的思索和追求,他对戏剧的爱好,他的种种审美情趣以及待人接物、爱情婚姻等,都无不打上他的个性烙印。”“二、他是有他的创作个性的。他的艺术追求,他的创作道路,不但与他的性格有关,而且更有形成他创作个性的世界的、中国文学戏剧的背景和种种动因,应当揭示他艺术成功的秘密。”“三、曹禺作为一个剧作家,是有他的典型意义的,他的创作道路就是话剧史的一个侧面,与之联系的、平行的话剧史上的人物都成为与他相比较而存在的对象,在比较中才能看到曹禺的独到的贡献。”^[1]《曹禺传》以其“翔实的史料,恢宏的构思,新颖的视角和飞扬的文采,而达到了作者预期的目标——写出了‘这一个’曹禺,写出了‘一个历史长河中流动的人’”。^[2]“作者以莫大的勇气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曹禺的艺术创作生涯做出了客观与公允的评判,真实而深刻地总结了曹禺个人的成败得失,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应该足以引起学术界深刻反思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运动的某些历史教训。”^[3]

在这部传记中,田本相层层递进,从原生家庭的苦闷——情感历程的曲折——创作心理的隐秘——形象孕育的机理——戏剧诗意的憧憬——悲剧美学的构成等层面,阐发了“中国的莎士比亚”的个性特征和艺术风格。

作为《曹禺传》的延伸成果,2001年,《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出版。此书真实地记录了历时20年田本相对曹禺及其亲朋故旧的采访内容,这其中有曹禺先生对自己家世、生平、创作、思想的回顾,有他对历史问题和现实创作状况的深刻反思,还有故旧亲朋对曹禺个性、心态、为人的品评,更有田本相写下的访谈气氛、神韵以及意会、心得。

巴金曾多次敦请曹禺“交出心灵的宝贝”,但限于晚年的境况,曹禺已经很难提笔“从命”了,他说:写作这东西,可是心血,是心血啊!他的心血郁积了大半生,浓得很了便流不出了,因此,一位值得交心的人的出现,终于使他的心血自然地涌出。曹禺对戏剧创作规律的深刻体认,对戏剧发展历程的追索、总结,对盲目追随西方各种主义的行为的反感,对“戏剧实用主义”的透彻批判,皆因透过了一个伟大作家的个体心灵这面凸镜,经历了一个苦闷灵魂一生的摸索、聚焦,才显示了带有普遍性的深刻意义。此书不仅引导我们认识一个伟大的戏剧家曹禺的灵魂,也会让我们透过一个生命去具体地认识近一个世纪的戏剧史,甚至从一个侧面去认识特定时期内一个民族的精神轨迹。

[1] 田本相:《曹禺传》,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后记”,第545页。

[2] 高鉴:《阅人如阅川——读〈曹禺传〉》,《文艺报》1989年4月8日。

[3] 宋剑华:《寻求“似”与“是”的统一》,《中国文化报》1990年1月10日。

三

田本相是一位很有学术个性的曹禺研究者。他的研究方法不同于西方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新批评、符号学和文本理论,他所秉持的理论武器是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唯物主义、辩证法,此外他还深受俄苏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思想影响。

宁宗一作为田本相在南开大学时的同窗,曾经指出,田本相对曹禺剧作的解读与阐释,在方法论上深受苏联文艺理论家、斯大林文学奖获得者叶尔米洛夫的影响。叶尔米洛夫在《论契诃夫的戏剧创作》一书中,对契诃夫剧作的戏剧意象、人物性格、情节场面、命运走向,乃至语言背后的心理波澜和细微表情下的情感冲动,都做了鞭辟入里、切中肯綮的细致分析,特别是他透过戏剧的表象开掘了静水深流般蕴藏在河床之下的时代趋向和生命底色。“对戏剧巨匠的创作,必须挖掘其底蕴和把握这‘潜流’,因为这是理解文本的要穴。也许由于大师的剧作都具有这种直接的现实背景下一股缓缓流淌的‘潜流’,它的生活底蕴往往不是一眼就可以看清的,因此挖掘它就成为理解文本审美价值的关键。叶氏找到了契诃夫剧作中的‘潜流’,于是他把契诃夫研究提升到一个新高度;而本相也找到了曹禺剧作中的‘潜流’,于是本相的曹禺剧作论就在一个新的层次上发现了曹禺剧作取之不尽的隐性价值。”^[1]

[1] 宁宗一:《田本相剧学思想研究》,《美育学刊》2014年第6期,第18页。

宁宗一从《曹禺剧作论》中看到了田本相阐发的曹禺生命中的痛苦和剧作的诸多隐喻。

如果说每一部戏剧都是寄托着曹禺人生诉求和理想憧憬的隐喻,那么每一个隐喻背后的深意,都是田本相洞幽探微、试图捕捉并昭示后人的东西。他在感知了曹禺剧作的“深刻”之后,试图将自己的灵魂装进角色的皮囊,以一己之心揣度剧中人心,他大声朗读剧本、让自己化身角色、进入戏剧情境等等,都可以看成是体会角色的心境、人性的行之有效的。对于研究对象,他入乎其里,又出乎其外;深入文本之内考察戏剧内里的符号的“编织”,又跳出文本之外斟酌其在话剧史乃至文化史上的位置。因此他对曹禺戏剧的评价是有温度、有情感的体悟,也是有学理、有创建的批评。

田本相特别重视《雷雨·序》《日出·跋》以及曹禺谈创作的一系列文章,将这些当作解读其作品的一把钥匙。比如曹禺说,繁漪具有最“雷雨的”性格,《雷雨》不是社会问题剧,他是在写一首诗,扮演周萍的演员要努力在观众那里找到同情等等,在田本相的戏剧分析中,都能找到思索的痕迹和推演的过程。

田本相显然不赞同法国作家罗兰·巴特所谓的“作家已死”的观念——罗兰·巴特认为,作品完成之际,作家应当被“遮蔽”,余下的文学意义在于接受者与被写成的文本所建立的新关系。田本相运用访谈调研的方法,花费漫长时间开掘关于曹禺家世、经历、心灵、意志、精神等第一手资料,寻找创作者的深层文

化心理、艺术个性在作品中的投射、反映;但他又并非唯作家的马首是瞻,以曹禺之言证曹禺之剧,而是着力寻觅生命哲学——精神现象——艺术创作——形象体系——美学范式的潜在的深层的对应关系,创造一个基于文本阐释、关照现实语境、考察创作者的心灵诉求、参照历史时空变化的立体的、多维的阐释方式;而剧作家——剧作——历史语境——美学神韵——文化系统,一直都是田本相在曹禺研究中考察、审辨、解析、掘进的一整套研究系统,并将其终极目标指向文化建构的意义。

维特根斯坦曾经指出:“如果一个人喜爱一位作家,那他一定也会喜爱这位作家所属的文化。如果一个人觉得这种文化是无关紧要的或令人讨厌的,那他对这位作家的赞美就会冷淡下来。”^[1]田本相的确是在审视曹禺的创作心理,从而剖析出曹禺剧作的深层含义。一个民族的文化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心灵史。而伟大作家的的心灵史,无疑具有民族特性、典型价值和深远的文化影响。

田本相的曹禺研究不是孤立的个案研究,也不是局部的现象研究,前面已经提到,他青年时期在鲁迅研究中不自觉地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到他主编《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再到他研究曹禺的现代意义及其文化价值,他一直沿用着“比较”的艺术的思维方式。他这样评价曹禺:“一方面,他继承着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精

神,充分汲取了新兴话剧的经验,更避免了它的教训;另一方面,他循着易卜生、契诃夫、奥尼尔等人的近代现实主义的潮流,领悟着他们的戏剧审美特质和发展趋势,寻找着中国观众可接受的东西,闯开一条新路。”^[2]比较的意识有时候表现为研究对象与同时代的其他者的关联,有时候表现为中外影响研究的论证,有时候则表现为在历史、现实、价值的三维坐标系中对其存在意义做出的标定。

回顾田本相的研究进程,不难发现,他所秉承的是比较传统的研究理路:先从文本出发,对剧作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继而又孜孜矻矻各处采访,博观约取,研究曹禺的生平和创作心理;转而又尽己所能,推动方方面面的曹禺研究;进而又在《曹禺传》中对既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新的整合;从而走过了从局部到总体、从现象到一般、从戏剧分析到文化价值标定的学术进程。他所建构的研究框架也许并不时髦,却是扎实稳固的;他得出的学术结论也许并不奇妙,却是真实有效的。他以自身不遗余力推进的曹禺及其戏剧的研究,为后学展现了从曹禺剧作到生平、从创作心理到文化内涵、从主体阐释到客观描述的集成成的曹禺研究的完整形态。

四

关于曹禺及其戏剧的研究,田本相的重要学术发现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1] [英]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文化和价值》,黄正东、唐少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20页。

[2] 田本相、刘一军主编:《曹禺全集》第一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前言”,第3页。

1. 摹画曹禺的灵魂,发现其创作动因。

这里有几个重要的概念:

(1)苦闷。曹禺曾经对田本相说,“你要写我的传,应该把我的心情苦闷写出来。”^[1]田本相果然写出了曹禺的苦闷,并且把它当成了笼罩在曹禺头上挥之不去的乌云。日本文学理论家厨川白村认为,文学是苦闷的象征。曹禺虽然自幼生活优裕,但由于生母早逝,父亲严厉,直接导致了亲情关系的扭曲和家庭氛围的冷寂,也造成了童年曹禺内心的苦闷和压抑。在《雷雨·序》中,他说,“我不知道怎样来表白我自己,我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涩;纵然在人前我有时也显露着欢娱,在孤独时却如许多精神总不甘于凝固的人,自己不断地来苦恼着自己……心里永感着乱云似的匆促”^[2]。这是敏感、忧郁的灵魂。

(2)抑压。在曹禺的生命的苦闷中,田本相发现了他对宇宙人生的残酷所感到的“抑压”,“这种抑压感,在曹禺的灵魂里几乎是全方位的:是社会的抑压,是人性的抑压,是生命的抑压,是情感的抑压,甚至是性的抑压”。^[3]“难得的是,这样的生命的抑压感,以及由这种形而下的生命感觉而衍生出来的形而上生命哲学的意味,让曹禺展示出形形色色的具有丰富生命感觉的艺术生命。”^[4]作为对这种

生命压力的反弹,曹禺在写作中释放着激情。

(3)自由。田本相认为曹禺具有一个伟大的渴望自由的灵魂,可惜“文革”剥夺了他的创作权力,“文革”后的他如同王佐断臂。“他那种渴望自由,渴望创造的夕阳之火,怎样也燃烧不起来了。不能不写的渴望同不能写出的矛盾,成为他晚年痛苦的源泉。”^[5]田本相考察曹禺的情绪、心理,是为了总结深层的艺术创作规律。

2. 解析曹禺的戏剧文本,阐发诗化现实主义风格。

田本相特别重视剧作家在戏剧发展中的作用,他说:“从中外话剧的发展历史来看,基本上是由杰出的戏剧家引领戏剧前进的路程。重要的戏剧思潮和导演学派,大都是由杰出的剧作家和杰出的剧作所引领和激发的。在戏剧史上能够成为里程碑的人物绝大多数是剧作家。”^[6]“任何伟大的剧作家,都有着时代的正义感,社会的责任感;但他们的剧作同工具论是绝缘的。”^[7]田本相在他有关曹禺研究的一系列专著中,都有对于其戏剧文本的不断解读和深入阐发,他的批评方式已经影响了后续的曹禺研究者。比如田本相特别注意分析曹禺戏剧的抒情性,从分析其少年时期的诗歌的意象、情调、风格,进而分析其戏剧的美学特点,甚至有人认为田本相的《曹禺传》为了对应曹

[1] 田本相:《曹禺传》,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第1页。

[2] 曹禺:《雷雨》,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序”,第5页。

[3] 田本相:《一个渴望自由的灵魂——为纪念曹禺百年诞辰而作》,《文学与文化》2010年4期,第4页。

[4] 同上,第5页。

[5] 田本相:《一个渴望自由的灵魂——为纪念曹禺百年诞辰而作》,《文学与文化》2010年4期,第7页。

[6] 陶璐:《重振困境中的中国话剧——访话剧史研究专家田本相》,《中国文艺评论》2016年第9期,第124页。

[7] 同上,第123页。

禺这样一位戏剧诗人的身份特征,也有意保持了传记语言的诗性特征。谈到《曹禺评传》的写作,田本相说,如果说有点发挥,那就是对曹禺戏剧的诗化现实主义的萌生、发展和成熟做了一次系统的勾勒和剖析,曹禺作为一个戏剧诗人,他把戏剧诗写到一个极致的境界,而我认为正是在这一点上,深层融汇着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和诗性哲学,正是在这一点上打通了中外戏剧的联系,使他的剧作既属于世界的,更有着东方的神韵。^[1]田本相将曹禺的诗化现实主义概括为:(1)诗与现实的融合所呈现的特色,即以诗人般的热情去拥抱现实;(2)带着理想的情愫去观察现实和描写现实;(3)诗化现实主义的艺术重心在于成功塑造典型形象,探索人的灵魂。对诗性的强调,便是对艺术性的重视,对戏剧的修辞方式、语词节奏、意象符号、美学意境的倚重。他重视剧作家主体意识的体现、想象力的生发、诗意的憧憬,以此对抗戏剧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

3. 揭示曹禺戏剧的现代性与民族性,阐发其文化价值和影响。

曹禺深谙中国戏曲,对《走雪山》《斩黄袍》之类喜爱有加,但他本人所受到的却是南开学校、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的现代教育,他的剧作中蕴蓄着鲜明的中国文化意绪和民族审美情趣,但又深受自古希腊以来西方优秀的戏剧文化的熏陶。在《雷雨》出版之后,李健吾就提出批评,指出剧中蕴含着古希腊悲剧特征和外国

现代戏剧的情节模式等。曹禺对此予以反驳,并说也许自己用了别人的金线织成了自己的衣裳。田本相从不回避曹禺的戏剧创作所受到的外来影响,甚至将其视作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并且运用比较艺术学的研究方法,对于曹禺所受到的诸如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易卜生、契诃夫、奥尼尔等剧作家和作品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认为“曹禺借鉴外国戏剧的经验可归结为两点:一是以作家的艺术个性的主体去消化外来的东西;一是以民族的主体,即以强大的自主的民族灵魂和艺术传统去借鉴和汲取外国戏剧中有益的东西。而这二者对曹禺是统一的。譬如他对外国戏剧表现派、象征派的创作方法和技巧,不但不去机械模仿照搬,而是把它同民族文学艺术传统中的象征艺术结合起来,使人感到其中贯穿着中国艺术的情调和韵味”。^[2]田本相不仅对曹禺剧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中的影响进行了学理的辨析性的论证,而且对处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与碰撞中的曹禺那种既不一味复古也不盲目崇外的兼容并蓄、消化吸收的艺术思想予以充分肯定。田本相反对在思想理论方面言必称西方的文化自卑,也不赞同什么事情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文化自大,在曹禺研究方面他“东张西望”、有的放矢、史论结合、实事求是。

4. 揭示曹禺的悲剧价值,展现其人文主义的悲悯情怀。

在曹禺的审美意识中,“宇宙正像一口残

[1] 参见田本相、刘一军:《曹禺评传》,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后记”,第303页。

[2] 田本相、刘一军主编:《曹禺全集》第一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前言”,第11页。

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1]因此他要在他的戏剧里把这种残酷性以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他说:“《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这种自然的‘冷酷’,四凤与周冲的遭遇最足以代表。他们的死亡,自己并无过咎。)如若读者肯细心体会这番心意,这篇戏虽然有时为几段较紧张的场面或一两个性格吸引了注意,但连绵不断地、若有若无地闪示这一点隐秘——这种种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2]因此《雷雨》《日出》《原野》《家》都是悲剧,曹禺自己认为《北京人》是喜剧,原因是愔方、瑞贞等人终于逃出了封闭、衰朽、压抑的家庭,可以走向新的人生,但是剧中的悲剧氛围也如黑云压顶。田本相重视曹禺剧作的悲剧特征,他强调曹禺的创作个性,正是在悲剧的美学层面上对其进行艺术价值的认定。正如朱光潜所言:“写实主义与悲剧精神是不相容的。悲剧中的痛苦和灾难绝不能与现实生活中的痛苦和灾难混为一谈,因为时间和空间的遥远性,悲剧人物、情境和情节的不寻常性质,艺术程式和技巧,强烈的抒情意味,超自然的气氛,最后还有非现实而具暗示性的舞台演出技巧,都使悲剧与现实之间隔着一段‘距离’。悲剧情节通过所有这些‘距离’处理之后,可以说被‘过滤’了一遍,从而除去了原来的粗糙与鄙

陋。”^[3]田本相十分重视朱光潜的悲剧研究成果,也认真分析了悲剧卡塔西斯效应对于曹禺和观众的双重属性,从而阐发了曹禺悲剧创作方法的继承性、创新性和民族文化特征。

要想较为全面地评价田本相在曹禺研究方面的贡献,对于我这样一个愚钝的后学绝非易事。在曹禺研究方面,田本相没有“建体系”“定高度”,而是用一种实证、阐释、分析、论辩的方法,在充分收集资料的基础下,扎扎实实地开展研究工作。其实作为后来者,有谁还能成为曹禺先生的“度心之人”呢?或许有,但却再无他人能从曹禺先生口中,掏出那么多他“心中的宝贝”了。在没有田本相的时代,后来者或许可以从某个角度,就某个层面,做出自己的学术发现,但要全面超逾短期之内恐难成功。田本相的曹禺研究,带动了新时期学术界“曹禺热”的形成,这股热潮至今方兴未艾。

在中国学术界若干个“理论体系”盲目建立旋即又烟消云散之际,在人们总是习惯于追随并因袭一套西方话语,把中国自己的艺术“宰割”得体无完肤之时,我们的学术界确实到了应当反思“中国的学术究竟是什么”的时候了,而反思田本相的“曹禺研究模式”对我们无疑具有启迪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

(责任编辑:陶璐)

[1] 曹禺:《雷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序”,第7页。

[2] 同上,第5页。

[3]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五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328页。